

文化遗产保护在上海新城镇建设中的意义

【摘要】 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遮蔽了乡村文化的优势，导致大批文化遗产在新城镇开发过程中被破坏。实际上，文化遗产保护对中国当代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文化遗产是新城镇建设的文化基础，是赋予新城镇文化生命力和文化特色的根本源泉；其次，文化遗产是新城镇产业开发的重要资源，为各新城镇打造特色产业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and 基础；第三，文化遗产保护是新城镇增强人口吸引力，加强区域文化认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文化遗产，新城镇，城乡二元结构

城镇化，简单来说就是将城镇作为乡村建设的模板和目标，将乡村转变为城镇，同时将乡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到稳步增长阶段。相关研究显示：从 1978 年到 2000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上升，城市建置由 193 个增加至 663 个，镇建置由 2173 个增加到 20312 个^①。21 世纪以后，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 2009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46.59%。^②

快速城镇化在地理面貌上造成了大量乡村聚落、传统建筑的消失。而这些正是传统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在城镇化中，因环境的改变而引起的文化遗产的衰落问题，并就此展开了思考与调查。总的来说，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保护文化遗产的观点、思路与方法，如：《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单霁翔，《城乡建设》2013 年第 6 期）、《问题与对策：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徐艺乙，《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新探》（谢中元，《理论导刊》2015 年第 1 期）；也有一些涉及到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彭兆荣，《西北民族研究》2014 年第 4 期）、《试论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朱峰，《知识经济》2015 年第 7 期）、《城镇化背景下文化遗产旅游与客家文化传承和创新——以福建永定土楼为例》（包晓莉、许良慧，《城市地理》2015 年第 2 期）。这些研究为城镇化大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与视角，但却未必能在实践层面上更好地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中国城镇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已经是从政界到学界的统一看法。推进城镇化就会破坏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国当代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之间似乎有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解决这一矛盾，在实践层面上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大都是一句空话。但实际上，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并不存在天然不可协调的矛盾，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不仅没有妨碍，反而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和意义。下面，本文将以上海新城镇建设为例来说明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一

上海新城镇的发展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一城九镇”的战略布局，由此开启了上海城市布局的新变化。21 世纪初，《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中明确提出郊区要集中力量建设 11 个新城。此后，上海郊区城镇化布局几经调整，先后出台了“关于切实推进‘三个集中’加快上海郊区发展的规划纲要”、“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本市加快新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多项文件，最终形成了“1966”新城镇体系。1966，即 1 个中心城、9 个新城、60 个左右新市镇、600 个左右以行政为单位的中心村。新城镇作为其所在区县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人才聚集地，对所在区县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引领作用，带动了本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十二五”期间，上海新城镇稳步发展，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组团、敞开式的城市结构”^③。新城镇的发展也起到了引导上海市区空间拓展，疏解市中心人口与功能的作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2010 年上海 2300 多万常住人口中，约有五分之一集聚在郊区新城，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长近一倍^④。

在上海新城镇建设发展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七城一面”的倾向非常严重。“七城一面”，也就是说七座新城无论是从建筑形式、经济特色还是文化发展上都表现出趋同的倾向。“七城一面”主要表现在：第一，各新城镇的文化特色模糊。相似的现代建筑取代了有鲜明特色的传统建筑，不少传统建筑（有些甚至是各级文物）因为城镇化的发展而面临灭顶之灾。一些极富特色的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受到忽视，更因为环境的急剧变化而濒临灭绝；第二，七座新城因区位和发展历史的不同，早已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传统产业，但城镇化过程中引入的现代产业布局未能充分尊重历史特色和发挥市场作用，严重削弱了原有的传统产业，消弭了区域产业特色；第三，新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不足。比较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会发现：十年间，郊区（县）作为外来人口集聚的核心地区，人口增长占整个上海人口增长总量的 99%，但外来人口导入却与新城错位，他们更多集中在新城周边的乡镇，新城未能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导入地^⑥。

以城镇为模板发展乡村，将各自不同的乡村发展为几乎相同面貌的城镇，这恐怕是中国城镇化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多城一面”现象的根源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城乡关系变迁概括为三阶段：城乡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城乡融合。而要达到城乡融合，“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⑦。西方的城市化，基本是沿着马克思所概括的这条道路前进的：工业革命加速了城乡分离，在此基础上，二战以后不久，西方国家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走向了城乡融合的局面。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虽然也有与西方相同的原因，比如市场成长，分工深化等，但也有与西方不同的原因。中国城乡分离的加速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国外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所导致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城乡关系的政策与制度，比如：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要素流动控制等。这些政策与制度确保了农业对工业，乡村对城市的长期支持，也令乡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固化了城乡差别。而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利用自身优势和国家优惠的改革政策先富起来，更加剧了城乡差别。尽管在 21 世纪以后，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中城市偏向的政策有所转变，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城市偏向的政策还是很难改变。而且三十多年来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的心理及文化定势。这种定势简单概括就是：“城市=先进”，“乡村=落后”。

随着上海新城镇的建设，大量农村聚落消失，传统建筑，甚至历史文物都遭到破坏，消失或损坏的资源不胜枚举，青浦区的孔宅，松江的超果寺、岳庙，金山的法忍教寺，南汇的福泉寺，浦东的庆宁寺等。以浦东地区为例，根据 2011 年 6 月结束的浦东新区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统计，从 1985 年第二次文化普查结束至第三次文化普查，浦东新区消失的已登记历史文化建筑、遗址及纪念物等文物共 139 处。尤其在原农村、郊区地带在城镇化中消失的数量占多数。同年的一个调研将调查的对象扩大到所有有据可查的文物，该调查表明：浦东有史可查的建筑遗产和纪念物原本有 468 处，但随着浦东地区新城镇建设和旧城改造的进行，不少遗产永久消失。其中消失最快的时期是 1990 至 2000 年之间的 10 年间，共 117 处建筑遗产和纪念物遭到彻底破坏。这一时期正是上海城镇化迅速发展时期。2000 以后，建筑遗产和纪念物的消失速度虽然放缓，但此类情况依然存在。从 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间，共有 50 处建筑遗产和纪念物遭到彻底破坏。在这些被破坏的建筑遗产和纪念物中，不少都是当地有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三林九曲桥，洋泾老街，南汇十字街，古石桥，川沙镇“飞虹复道”，庆宁寺小火车头，同乡会旧址，海派艺术大师钱惠安、王一亭旧居等^⑧。

随着环境的变迁，新城镇所在区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也在加剧。一些传统资源，如崇明的扁担戏、南汇的锣鼓书、松江的顾绣等，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在上海的民俗文化形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传统民俗文化的品牌项目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衰落消亡现象十分严重。传承人的缺乏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崇明的扁担戏又称布袋木偶戏，在崇明已有 150 多年历史。但是至 50 年代初，能够掌握此戏技艺的便只剩 10 多人，而现在更是只剩 1-2 人。松江的顾绣、嘉定的竹刻等传统民间工艺虽然至今尚能生存，但其社会影响也有逐渐衰落之势。

如上所举，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和文化定势遮蔽了乡村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导致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乡村文化遗产因为代表着“落后”而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二

上海新城镇所在的郊区地区是上海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区，拥有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历史文化建筑（群），历史文化纪念物、古镇古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最富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资源，是郊区民间“生活的华彩乐章——是民间知识的精华形态”^⑧，文化特色鲜明，文化优势明显。

上海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化史始于新石器时期。在中国古文化遗址类型中，有两种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崧泽文化与马桥文化。崧泽文化距今 6000-5300 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以首次在上海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命名；马桥文化为夏商时代的文化遗存，以最早发现于上海闵行区马桥镇而命名。上海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古文化遗址集中分布于青浦、金山、松江、奉贤四个区，包括：青浦区的崧泽古文化遗址、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寺前村古文化遗址、金山坟古文化遗址、刘夏古文化遗址，金山区的查山古文化遗址、亭林古文化遗址、招贤浜（张堰口）古文化遗址、戚家墩古文化遗址，松江区的广富林古文化遗址、汤庙村古文化遗址、平原村古文化遗址，奉贤区的柘林古文化遗址等。这些古文化遗址展示了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的文化史发展脉络。

上海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的历史文化建筑及纪念物遗存数量众多，其分布最集中的是嘉定区、浦东新区、青浦区和松江区。根据不完全统计，这四区代表性历史文化建筑和纪念物存量^⑨分别有 48 项、47 项、45 项和 42 项。其中，以桥梁、宗教建筑（佛寺、道观、天主堂、基督堂等）、故居民宅为主要形式，各种桥梁的存量最丰富。比如青浦区代表性历史文化建筑和纪念物有 45 项，其中 27 项都是桥，占总数的 60%。奉贤区的 13 项代表性历史文化建筑和纪念物中，有 8 项是桥，占总量的 61%。这充分说明部分新城镇所在区域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

新城镇所在区域古城、古镇密布，代表了本区域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根据文献资料、传说及考古发现，金山新城所在区域的城池建设和城镇发展甚至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传说西周康王东巡大海而建金山古城。其中代表性的资源如青浦区的青浦古镇、徐泾蟠龙古镇、重固古镇、金泽古镇、白鹤古镇、朱家角古镇、练塘古镇，浦东区的三林塘古镇、下沙古镇、新场古镇、川沙古镇、六灶古镇、大团古镇，金山区的枫泾古镇、亭林古镇、朱泾古镇、张堰古镇，嘉定区的南翔古镇、嘉定古镇、安亭古镇、娄堂古镇，松江区的泗泾古镇、松江古城府城、松江府城仓城，奉贤区的奉城古镇、青村古镇、庄行古镇等。

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域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资源，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到 2015 年 7 月，上海市共评出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20 项^⑩，7 个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共拥有市级名录项目 97 项，约占到全市非遗总量的 44%。也就是说，全市将近一半的非遗项目都可以在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中找到。其中，第一批市级非遗项目共 83 项，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共拥有 41 项，约占 49%。第二批市级非遗项目共 45 项，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共拥有 20 项，约占 44%。第三批市级非遗项目共 29 项，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共拥有 15 项，约占 52%。第四批市级非遗项目共 13 项，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共拥有 7 项，约占 54%。第五批市级非遗项目共 41 项，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共拥有 14 项，约占 34%。

但是这样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却在新城镇建设过程中遭遇到了毁坏与漠视。其重要原因是在新城镇的建设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相关机构与单位，都未能正确认识文化遗产对于新城镇发展的重要意义：保护文化遗产有助于解决新城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第一，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域的文化遗产是新城镇建设的文化基础，是赋予新城镇文化生命力和文化特色的根本源泉。

目前上海新城镇开发的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房地产开发。在每一座新城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大量新建楼盘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外观现代，绿化标准，道路整洁。但不借助地图导航，就无从分辨身在何方。这些新城镇只有漂亮的外观，却毫无文化生命力和文化特色。与此相反的是：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域原有的文化遗产项目则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总的来说，可以将上海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的文化类型划分为两大类：以海洋渔业、盐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海洋文化特色，以稻作、棉花以及渔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江南水乡文化特色。如濒海的金山新城与城桥新城具有浓厚的海洋文化特色，拥有大量与海洋生产与生活有关的习俗与技艺等文化遗产；又如青浦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原始水稻种植，历史上一直是农业大县，元代又开始了种植棉花的历史，因此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文化特色。当然，并非所有的区域都只具有一种文化特色。奉贤南桥新城及其文化遗产就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但因为奉贤区东部沿海，东西两部分区域文化遗产也有明显差别。比如祭祀习俗就有差别，东部沿海民众在新船或新修的渔船下水前要在船舱中举行祭海仪式；而西部内陆民众则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神农氏，在下秧田撒谷种时举行祭天地仪式，在久旱时要举行祭天求雨仪式。

将这些文化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元素融入到新城镇的开发中，新城镇将会成为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鲜活文化生命力的城市。但在具体开发中，却并未得到重视。以松江地区开发为例，这里曾发生过两件令人啼笑皆非，扼腕叹息之事。松江地区历史悠久，有“上海之根”之称。松江佘山地区最重要的文化特色莫过于与“三泖九峰”相关历史文化资源，这里曾是三国大将陆逊的封地，晋代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的故乡。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旅游部门却别出心裁地在山中人造防空洞内移植了西游记人造景观。因为与当地历史和民间文化传承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游客寥寥，最后损失惨重。当时，松江曾先后投资二三十亿人民币进行此类的旅游开发，都以失败告终；到了新世纪，松江新城开发时重点打造了“泰晤士小镇”。“泰晤士小镇”是面积一平方公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以英式河边小镇为其建筑风格，其宣传口号之一是“情系英国”，曾是上海“十五”期间的重点核心项目。虽然该项目屡次被当地政府作为正面政绩提及，但因为与当地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最后只能沦为婚纱照取景地，贻笑大方。松江当地早在魏晋时期种植业就相当发达，陆氏家族在这里发展出自给自足的江南庄园经济，如果将这些资源作为房地产开发的元素，以江南庄园替代不知所云的英式风格泰晤士小镇，那将是多么有文化内涵，匠心独具的设计。

第二，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域的文化遗产是新城镇产业开发的重要资源，为各区新城打造特色产业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and 基础。

前文已经提及：上海郊县拥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中，最集中和最优势的莫过于传统工艺、技艺与传统美术项目，以及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类项目。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拥有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工艺、技艺与传统美术类项目 40 项^①，占全部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市级项目的约 41%；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拥有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曲艺项目 30 项^②，约占新城镇所在区县所有市级项目的约 31%。

这些技艺、美术、戏曲、舞蹈之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中最容易被产业开发的种类。而且，从上表也可以见出，区县之间的补充名录并不多见，这说明每个区县都拥有大量的、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如嘉定区的竹刻、徐行草编，松江区的顾绣、十锦细锣鼓，奉贤区的木雕、山歌剧，浦东新区的锣鼓书和浦东说书，青浦区的田山歌和烙画，金山区的金山农民画和枫泾蹄蹄制作技艺，崇明县的灶花和扁担戏。如果这些项目能得到较好的开发，将为各区县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但现实情况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的大多数都还没有能进行产业开发。即使是那些已经被开发的项目，也因为种种原因止步不前。比如金山农民画就因为有良好的管理方法而遭遇了侵权盗版的伤害。金山农民画是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随着金山农民画的声誉鹊起，大量假冒赝品也随之出现，并且低价倾销，其他农民画也东施效颦，给金山农民画这一民俗文化品牌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第三，保护新城镇及其所在区县的文化遗产是新城镇增强人口吸引力，加强区域文化认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足量的人口是新城镇建设的基础。上海新城镇人口构成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方面是原有的农民，在新城镇建设中转为市民；第二方面是市区人口在旧城改造中因拆迁而迁入新城镇；第三方面是外来人口的迁入。在这三方面中，原有市区人口的比例最低。因为新城镇中的大部分实际上位于远郊。而市区人口的外迁更倾向于近郊，如浦东、宝山，他们对于远郊的新城并不那么热衷。有调查表明：上海市人口分布空间变动表现为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环状分布模式，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人口密度快速上升区域主要仍集中在近郊，并与原本的中心城相连成片^③。而新城镇中外来迁入人口的数量则逐年上升，这一部分人口是

新城镇建设的重要基础。有研究表明,2005年之前,外来人口迁入倾向选择近郊区。而“2005年以来,以外来人口为先行军,上海人口分散分布正在向远郊区推进”^④。“不同于户籍人口的环状增长模式,外来人口在空间上呈面状增长态势,增长速度最快的街道、镇均位于远郊区”^⑤。外来人口迁入是重塑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2000-2010年,除松江新城以外,其余各新城及其所在区的新增外来人口占总人口增量比重均在70%以上,青浦区的相应比例最大,达到96.9%,其次是奉贤区,为92.0%,松江新城的人口增量中外来人口也占到52.3%。”^⑥但正如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不少外来人口没有直接选择新城居住,而是散居在新城周边的乡镇。

新城镇对外来人口缺乏足够吸引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活成本、就业机会、交通等,改善这些条件对于暂时吸引外来人口将有重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却不会增加多少新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原因在于外来人口在新城镇无法寻找到文化认同,因此无法迅速融入新城镇,并长期定居。外来人口是新城镇人口中最不稳定的一个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暂时停留在新城镇谋生,一旦其他地方有更好的条件,他们可以随时离开。另一方面,因生活习惯、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较难融入新城镇社会。外来人口的轻易流动以及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必然影响新城镇的长期稳定发展。所以关键是在要让外来人口产生对新城镇的文化认同,进而产生依恋感情,从心理上促使他们留在新城镇,化解他们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文化遗产要比其他的法律、政策更具有效果。

作为文化精华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生活哲学,充满了民间审美情趣和民间智慧,功利色彩较淡。无论籍贯、背景如何,在文化遗产的欣赏方面,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都可以找到共同点。因此,借助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活动,(如上述的音乐舞蹈戏曲类遗产就是非常适合大众参与的项目)吸引外来人口的参与,让他们了解新城镇的历史文化,有助于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交流,更有助于培养外来人口对新城镇的认同感。认同感是个体对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是维系社会的情感凝聚力,外来人口对新城镇的认同感有助于构建区域和谐社会,从而促进新城镇的发展。

综上,上海新城镇建设是中国当代城镇化的一个缩影。文化遗产保护对新城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上海新城镇建设中诸多问题的出现都与没能认识到这些意义相关。总的来说,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及特色是新城镇开发的文化基础,是新城镇保持其文化特色,增强文化吸引力进而达成区域和谐的重要源泉,还是新城镇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财富。忽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将使新城镇丧失文化特色和文化魅力,从而影响新城镇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建设。

注释:

① 刘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问题和趋势》,《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刘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问题和趋势》。

③ 花建:《发挥文化产业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贡献力》,《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

④ 葛春晖等:《基于区位论的上海新城发展评估与策略》,《上海城市规划》2015年第6期。

⑤ 葛春晖等:《基于区位论的上海新城发展评估与策略》。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⑦ 参见《关于浦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调研报告》,完成时间:2011年9月,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284d0a0102dz8u.html.数据采集时间:2014年4月9日。

⑧ 田兆元：《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⑨ 为了考察的方便，“代表性历史文化建筑和纪念物”指纳入各级（国家级、市级、区县级）文物保护名单的文化建筑和纪念物。该部分数字统计资料来源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上海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部分）一览表》，参见：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官网，<http://wgj.sh.gov.cn/wgj/node1257/index.html>。数据采集时间：2014年5月1日。

⑩ 其中，第一批83项；第二批45项，扩展名录5项；第三批29项，扩展名录8项；第四批22项，扩展名录13项。第五批，41项，扩展名录16项。因为扩展名录是对正式名录申报地区或单位的补充，所以在计算五批名录的总数量时并未将扩展名录的数量计入。

⑪ 补充名录不计算入内。

⑫ 补充名录不计算入内。

⑬ 俞路、张善余、韩贵峰：《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的空间特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年第5期。

⑭ 王春兰等：《上海人口郊区化与新城发展动态分析》，《城市规划》2015年第4期。

⑮ 王春兰等：《上海人口郊区化与新城发展动态分析》。

⑯ 王春兰等：《上海人口郊区化与新城发展动态分析》。

[作者简介] 毕旭玲（1979-），女，山西阳泉人，文学博士，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与资源图谱研究”（项目编号：12ZD019）的前期成果。